
沈懷玉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

記錄：林東璟**

時間：2016年10月14日，下午2:50-5:30

地點：中研院近史所陳儀深研究室

沈懷玉女士，臺灣嘉義人，1949年出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聘助理、館員、編審兼口述歷史執行秘書，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第一、二屆理事，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第三、四屆常務監事。專長為民國制度史、口述史，長期分別從事警政人物、外交官、學術界（包含院士）、醫界、政治受難者、災變、都市計畫人物、臺灣高鐵、兩位蔣總統侍從人員、飛航專業人士的訪問，及參與人員培訓，並撰寫多篇口述歷史相關文章。2014年退休後，仍持續完成參與訪問叢書的出版，以及《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的編輯。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第四屆理事長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聘助理、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員

嘉義歲月

我是臺灣省嘉義縣人，1949年出生。父親希望我照顧弟弟，因此我跟弟弟同時就讀朴子國小，比同年的兒童晚一年入學。

小學畢業後，我考上嘉義女中初中部。每天清晨五點半要出門，否則會遲到，因我們家務農，種了甘蔗，可免費搭乘載運蔗糖的糖廠小火車上學。初中期間，我參加田徑隊，擅長百米短跑和低欄，但游泳就不行，別人游直的，我卻是橫的，游泳成績老是勉強及格。記得游泳池附近種了不少果樹，有芒果、荔枝，我們常趁教官不注意時用籃球「投籃」，樹上的芒果、荔枝掉滿地，體育老師懷孕的時候，我們還送她青芒果吃。我們班同學很活潑，學業和體育成績都不錯，運動比賽總是能得名。

初三的導師陳重光，他是畫家陳澄波的兒子。陳老師教數學，要我們去他家補習，沒補習的同學自然就考不好。爲了抗議，同學發動罷課，有一次輪到他的課，大家跑到操場附近坐在石椅上聊天，不上他的課。由於罷課的學生很多，老師也沒輒，不敢處罰我們。還有，教化學的老師，上實驗課時要同學吹氣，結果沒人願意吹，老師只好自己來，吹得滿臉通紅，我們給他取了綽號「紅豆」，老遠看到他，都說「紅豆」來了。另一位物理老師長得很高、很帥，有183公分，大家都叫他「183」。

初中畢業時，父親希望我考師範專科學校，但我在班上成績不錯，沒怎麼認真讀書，卻跟二十幾位同學直升嘉女高中部，師專也就免考了。

在中研院近史所的磨練

(一) 進所機緣

高中畢業時，我考上淡江大學，我不滿意想重考，但父親不同意，要我去考師大夜間部，於是在師大念了五年。印象比較深刻的老師是教西洋上古史、中古史的曾祥和，西洋近代史的高亞偉，史學方法的朱雲影，文化史的朱際鎰，明史的沈明璋，東南亞史的王啓宗，地學通論的任德庚、王月鏡，中國近代史的呂實強、王聿均等等。當年呂實強先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有一陣子他生病，由王聿均先生代課，他很厲害，上課時兩手左右開弓，左手寫字跟右手一樣好。

大四時，班上同學張秋雯考試成績不錯，呂實強先生找她到近史所做教務教案檔。剛好張朋園先生從美國回來，要編纂北洋政府職官年表，經費來源是「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需要助手，請張秋雯介紹人，1971年起，我就到近史所擔任助理。一年後，我們將初步成果發表在近史所的集刊上。後來發現大陸劉壽林編的民國職官年表已出版，我們就沒有繼續再編。

(二) 任現代化區域研究助理的訓練

1973年起，國科會補助近史所進行兩期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以沿江沿海地區的省分爲主，爲期四年，參與人員和負責省分分別爲：王萍（廣東）、李國祁（閩浙臺）、王樹槐（江蘇）、陳三井（上海）、張玉法（山東）、林明德（直隸）、趙中孚（東三省）、蘇雲峰（湖北）、張朋園（湖南）、呂實強（四川）。

當時社會學界很流行「現代化理論」，在歷史學界也形成一

股熱潮，許多人在學校授課也強調「現代化」的重要。但王爾敏教授不以為然，他說：「這些理論都會過時。」後來現代化理論果然如他所說過時了。不過，近史所當時還是以現代化理論來做區域研究。

我擔任張朋園與蘇雲峰先生的助理，負責湖北、湖南兩個省區資料的收集與做摘要。我在近史所圖書館長期看《時報》、《順天時報》、《海關報告》等微捲，很傷眼力，近視度數不斷上升。同時，還要看教務教案檔、往來函電、《政治官報》、《御摺彙存》、《皇朝經世文編》、《續皇朝經世文編》、《教育雜誌》、《東方雜誌》，名人日記、回憶錄、各年的年鑑，調查報告、省志與各縣地方志、各種論著等等。並到故宮看檔案，臺灣分館、國家圖書館找資料。計畫執行期間，曾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來演講，我們都要參加。工作相當辛苦，卻也學到很多。

第一、二期成果發表後，國科會相當滿意，也召開過大型學術研討會議。國科會希望以專題研究的方式去探討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化，有哪些阻力和助力，共有十個專題，參與人員還是原班人馬：交通現代化是王樹槐、農業現代化是林明德、政治現代化是張朋園、工業現代化是張玉法、教育現代化是蘇雲峰……等。計畫完成後，僅張玉法將他所寫的稿子交給書店出版，書名《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

我負責資料收集期間，讀的資料相當多、相當廣泛，而且受到張朋園、蘇雲峰兩位先生指導甚多。後來我寫了兩篇論文：〈清末地方自治思想的輸入〉、〈清末地方自治之萌芽(1898-1908)〉，先後於1979年、1980年發表於近史所集刊第八、九期。

(三) 編輯《國民政府職官年表》、撰寫《軍職制度》

區域現代化研究計畫結束後，我仍持續編纂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當時張朋園人在國外，我就借用師大的辦公室工作。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的難度比較高，在戰亂的年代，公報發表的任命，往往與實際到任的時間不同，甚至不見公報發表。我必須看相當多的資料核對，除了《國民政府公報》、各部年鑑、名人日記、個人年譜、回憶錄、1949年之前的《申報》、《大公報》、《中央日報》之外，還要到各檔案館看資料，包括國史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等。

當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位於公館，後來搬到大直，把那塊地還給臺大。我到史政局看軍事有關方面的檔案時，全錄搬了一部影印機到史政局印資料，有位上校給我相當完整的資料，包括將級和校級的資績簿，並且讓我影印，我也把軍事委員會及所屬各機關的資料都印回來，對我編纂職官年表的幫助非常大。

1987年，近史所出版《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由計畫主持人張朋園和我合編。由於書出版之後，經常有讀者電話詢問後續幾冊的出版，所方也希望我早點完成，從1989年開始，我常常去南京第二檔案館、南京圖書館特藏室、桂林圖書館、各省市檔案館看檔案。

由於我掌握了軍事方面的資料，國史館史料處張明凱處長跟我商量，讓我繼續去國史館庫房看軍事委員會相關資料，但是要幫國史館的《中華民國史公職志初稿》撰寫軍職制度的部分。因為他們找了幾位專家，都認為沒有資料，無法撰寫。張處長找我幫忙，並出公文給史政編譯局，同意我影印檔案。我不辱使命完

成 10 多萬字，此書於 1993 年出版。此外，國史館館長朱匯森也要我寫一篇〈近七十年來中國之兵役制度〉，1990 年刊登於《國史館館刊》復刊第八期。

之前，我找不到軍事委員會人事任命的資料，國史館張處長帶我到他們的庫房看，所有檔案幾乎被我看完了，他還介紹幾位曾在軍事委員會任職的當事人，請他們幫我修正稿子。

我在蒐集職官表有關各省行政督察專員資料時，到南京圖書館特藏室閱讀不少資料，也在南京第二檔案館、各省檔案館印了許多東西，及閱讀相關書籍等，除了解行政督察專員職官表的編輯，也發表兩篇論文。1993 年，〈行政督察專員制度之創設、演變與功能〉刊於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2 期上冊；1995 年，〈湖北省的行政督察專員制度（1932-1949）〉發表於《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下冊。

（四）負責人事與秘書業務

1990 年，近史所負責人事和秘書業務的周道瞻先生即將退休，張玉法所長告訴我，爲了合適的接替人選，他考慮了很久，問我願不願幫忙？我答應後，張所長把我補爲正式館員。那時周先生尚未退休，我跟著他學習，直到他退休後，相關業務由我接辦。

當時，中央研究院編制內的行政人員並不須具備國家考試及格的任用資格，相較於須通過高普考才具有任用資格的其他公務人員來說，就是「黑官」。1991 年 8 月，考試院特地舉辦「中央研究院現任行政人員任用資格考試」，大部分人都獲通過並取得任用資格，服務多年的薦任人員依年資，有的不須再通過升等考

試，可平步青雲的升上簡任，因此被外界譏爲「黑官漂白」。不過，後來我都是依年資、考績，通過考試院舉辦的全國性薦任、簡任升等考試，及取得證書。

我兼辦人事和秘書工作期間，非常辛苦。印象最深刻的是爲了向立法院、監察院提交成果報告，研究同仁交來的各自研究成果，我必須逐篇閱讀、彙整，就算屬性不同的主題也要歸納在一起，同仁的研究五花八門，還要綜合研究成果發現了什麼？當時，要繳交的成果報告都是急件，陳三井副所長非常體諒，我除了呈給他看外，有一半幾乎是他寫的。

當年，中研院有「五年計畫」，除了提交本所計畫外，還有執行的總檢討，總要絞盡腦汁大作文章，擬妥後，呈給副所長、所長核閱，來來回回不斷修改。這對我來說，是空前絕後，因爲我的前後任都不須做這項工作。

那時，兩岸開始交流，本所及史語所都提有兩岸交流計畫，必須提到中研院評議會討論。我記得評議會開會討論本所的提案是農曆年後的第一個工作天，在農曆年前我必須把工作計畫擬妥，呈給張所長核閱。爲了準備提交評議會相關資料，挑燈夜戰，張所長也一直在辦公室等我到晚上將近十二點，才拍板定案。

就所務來說，研究同仁除了通過所務會議，表達意見與討論外，有幾次，王爾敏先生、林滿紅女士等人送來萬言書，要我轉呈張所長，並不時電話急著詢問結果，我也僅能轉達。後來張所長因此召開了座談會，原本僅想聽聽研究同仁的心聲，王樹槐先生建議要讓行政人員、臨時助理也有表達的機會。結果善意傾聽的座談會簡直變成批鬥大會，所長主持完研究同仁的座談後，行

政與助理的座談交由我處理，大家意見五花八門，簡直讓人難以招架。這也是空前絕後，之後的歷任所長再也不曾召開這樣的座談。

我負責人事時，院方的人事主任戴輝昌是銓敘部調來的，他要求各所人事負責人列舉所長的具體事蹟呈交院方，這當然要報告張所長，結果他勃然大怒。其實，各所所長的考績是由院長打的，具體事蹟何須我們來擬？

當年行政同仁考績甲等的要項之一是請事假不能超過七天，我發現所有同仁爲了領不休假獎金，全年不請休假，都請事假，考績根據前面提到的要項照打甲等。但如果嚴格執行，請事假超過的都誠實列出，考績根據這個要項，就無人可以考甲等。經請教戴主任，他要求列舉同仁的具體事蹟，不得造假。於是我幫負責會計的何時編列預算、負責總務的何時協助研究大樓的承建、負責檔案徵集的何時徵集哪些檔案、協助國際會議召開工作者協辦哪些會議、辦理同仁升等案業務者都詳細列舉，也就解決了無人可考甲等的荒謬問題。

至於我自己，張所長要我自己列舉，我說應該由所長考核。因爲我到大陸看檔案，原本可請公假，但某人說只能請事假，我真的請事假超過一個月，依規定考績僅能乙等。

(五) 兼管電腦業務

當年，近史所電腦小組委員會委員胡國台、陳秋坤、黃克武三人意見不合，召集人蘇雲峰便解散委員會，但事情還是要有人做，張玉法所長要我兼管電腦業務，我說我對電腦外行，不具備資訊相關專業知識，怎麼管？張所長說：「妳非得管不可。」我

只得硬著頭皮兼管電腦業務，但太專業的東西就做不來。

當時近史所正在蓋研究大樓，要編列電腦設備相關預算，我編了總額一千多萬的經費，需獲得總辦事處計算中心同意才行，計算中心曾先生的條件是：要我跟所裡建議，把他們的技術人員黃佩燕補成近史所的正式人員，因爲計算中心沒有缺，讓她到近史所補缺，技術人員是以技術專業補缺，不是考試，最後黃小姐轉來近史所佔缺，計算中心也同意給我們將近一千多萬的預算。

接著我開始規劃細部科目，當時設備採購只能買個人電腦(PC)和不斷電系統(UPS)，以及消耗品，但光是個人電腦及消耗品的採購不可能買到一千多萬，我詢問廠商不斷電系統的價格，列在預算科目裡，當提到所務會議討論時，沒想到同仁群起攻擊，胡國台、劉鳳翰等人說：「買了這麼大型的不斷電系統，妳要放到哪裡去？」我說這只是編預算，非列出名目不可，實際執行時，不一定要採購不斷電系統，因科目之間可以流用。

一年後，我卸下兼管電腦業務，由胡國台主管，當時研究大樓已經蓋好，同仁們忙著搬遷，由於當初早已編列預算，所以研究大樓網路管線的鋪設、檔案館的光纖網路、電話的A&A系統等，都有充裕的經費可使用，也能持續更新資訊設備。

投入近史所口述史行列

(一) 初期工作

我兼管人事、秘書一年後，1991年8月，陳三井先生接任所長後，口述歷史執行秘書朱滋源卸任，陳所長把我調任口述歷

史的工作，原秘書工作由江淑玲小姐接任。我的角色是協助召集人推動口述訪問，並承辦所長交辦業務。就性質來說，涵蓋口述歷史較全面性的工作，這個工作我作了二十幾年，直到退休，碰到不少問題，也累積許多經驗。

近史所的口述歷史自1957年由創所的郭廷以所長推動以來，累積不少成果。至陳三井所長時代，口述歷史業務蓬勃發展。我接執行秘書時，召集人是陳存恭先生，之後是陸寶千先生，他們與陳所長早年都為口述歷史奉獻不少心力，極為重視口述歷史。初期我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把早期訪問的稿件找出來閱讀，通過審查後陸續出版，每年出版六、七本，1992年甚至高達十本。

在閱讀的過程中，對口述歷史有更深層的認識，諸多黨政軍等受訪者所談的內容，都跟我編輯《國民政府職官年表》所需資料有關，可更正一些錯誤。這就印證了郭廷以先生強調口述史料的重要性，為何創所後要投入人力做口述歷史，因為黨國元老不訪問，資料就不見了。

除了出版，同仁也展開新的口述訪談。值得一提的是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的訪問。1991年，行政院為研究調查二二八事件真相，成立二二八研究小組，並由近史所與所際、院際合作推動口述訪問，主訪人有近史所許雪姬、朱宏源，中研院三民所賴澤涵、師範大學吳文星、中興大學黃秀政等，受訪對象分北部、中部、南部展開訪問，訪問紀錄刊在近史所《口述歷史》第三、四期，我也要忙著送審、催借出版照片資料，以及校對工作。

之後，許雪姬接任口述史委員會召集人。1994年3月，高雄市政府委託近史所進行高雄市二二八受難者口述歷史訪問計

畫，簽約和預算會議地點在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我必須前往高雄參與會議。那時，公文往返長達半年，由於受訪者人數眾多，合約還沒簽訂，就先行快速展開訪談，許雪姬帶著三、四名助理，長期駐點高雄，密集展開訪問。

稿件完成後隨即就要出版，我完成送審後，卻面臨沒有印刷經費的問題，高雄市政府一開始不願意負擔印刷經費，幾經協調往返交涉，後來市政府動用第二預備金，印製《高雄市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下共三冊，於1995年2月出版。

（二）參與個人事功的專訪

1993年起，我受邀開始參與個人事功的訪問。我訪問的對象，都是別無選擇，而且都是使命必達，必須完成訪問、改稿的任務。先後參與的訪問有警政人物陳湄泉，副總統謝東閔，外交官陳雄飛，中研院院士許倬雲、羅銅壁，以及學術教育界人物曾祥和。其中，除謝東閔外，都已出版或即將出版。這幾本專書的訪問、出版，有不少曲折，有些經驗，倒可供從事口述歷史工作者參考。

1. 訪問女警官陳湄泉

1993年10月22日，國大代表、前臺北市警察局女警隊長陳湄泉打電話給我，說她撰有〈一個女警官的自述〉、以及國大代表相關資料、抗戰期間她先生趙炳坤在首都警察廳任內等資料要捐給近史所，並擬接受訪問。我向所方報告後，陳三井所長要我前往瞭解資料的性質，再決定是否訪問。

10月27日，我到新店中興新村國代宿舍拜訪陳代表，檢

視資料，確定值得訪問後，隔天決定由召集人許雪姬跟我一起訪問。當時，師大博士生陳純瑩爲了撰寫警政有關論文，11月7日也一起參與訪問。進行訪問兩次後，陳湄泉打電話告訴我：「陳純瑩不必再參加訪問了！」語氣堅決、不悅。原來是陳小姐問了一些惹受訪者不高興的問題，因此被拒絕參加。可見訪問提問是否得體非常重要，否則與受訪者一言不和、鬧得不愉快，如何再進行訪問？

我們進行數次訪問後，有關女警隊部分，分別訪問了鄧湘華、洪麗霞、黃瑛等相關人物，印證也補充受訪者創建女警隊的艱辛。可見訪問周邊相關人物，不僅讓口述歷史更周延、史料也更具可靠性。

陳湄泉與夫婿趙炳坤都是國大代表，趙先生已過世，有關國民大會部分，夫唱婦隨，陳女士也做了詳盡的口述。她跟蔣宋美齡關係良好，曾介紹數位女國代，要我們前往訪問，當時由於本所正聚焦二二八事件的訪談，無暇其他的訪問。這些女國代角色也頗爲重要，當我們想訪問時，可惜不是作古，就是已經無法談話。可見口述歷史是與時間賽跑，值得訪問者必須排除萬難，把握當下，起碼也要留下錄音紀錄。

陳湄泉的訪問一共進行十一次，定稿、通過審查及出版後，1996年元月《陳湄泉先生訪問紀錄》問世。這是我參與的第一本專書訪問。這本訪問紀錄出版後，公共電視曾據此做了女警官陳湄泉的特別報導。

2. 訪問謝東閔副總統

1993年11月，總統府沈參議打電話來，希望近史所訪問前

副總統謝東閔。召集人許雪姬對謝東閔比較瞭解，由她主訪，我也參與訪問。11月27日起我們到至善路官邸訪問謝副總統，訪問之前，準備了訪問主題與提問的問題，在訪問期間，隔年3月他住院臺北榮總，我們還到榮總病房進行訪問，至4月共訪問十二次。許小姐問了一些不錯的關鍵問題，由吳美慧整稿。不過，謝東閔自己寫了傳記《歸返：我家和我的故事》，內容與我們訪談的多所重複。他的秘書沈參議告知訪問至4月26日結束，因此近史所未出版他的訪問紀錄。

3. 訪問陳雄飛大使

2001年5月7日，外交部檔案資訊處鈕則勳打電話給我，告知要與本所簽約訪問陳雄飛大使，我向所方報告後，檔資處處長鄧申生等人來所與呂芳上所長談妥訪問委託案。我蒐集、閱讀資料，擬好計畫後，計畫主持人由留學法國的許文堂博士擔任，我參與訪問。

當時，外交部很慎重，鄧處長、段培龍代表於7月3日特別邀本所所長呂芳上、召集人陳儀深、計畫主持人許文堂及我在福華飯店與陳雄飛大使餐敘，並討論訪問大綱。7月6日開始展開訪問。

陳大使是上海人，留學法國，出使法國、比利時、盧森堡、烏拉圭，法語非洲各國獨立時，都是他前往商談建交，爭取聯合國席次，並保衛我方在各種國際會議中的席位；擔任外交部次長期間，我國退出聯合國時，他代理部務參與其事；退休後仍致力於外交工作。外交生涯自1940年起歷經一甲子，一生可以說就是一部精采的外交史。

當我們進行訪問時，陳大使滿口上海話，有時夾雜法文、英文、西班牙文，助理苦不堪言，只能協助錄音，大略做逐字稿，很難完整整稿，後來由我和許先生分別完成。而且陳大使提供我們不少函電、書信、檔案資料、照片，他自己不但到外交部看檔案，也要我們去看，可見他對口述史料精準度的要求。因此，在兩年的訪問期間，我一個禮拜至少要到外交部看三天檔案並影印，以便和許先生展開訪問前的準備工作，讓訪問能扣緊主題，內容更有深度、廣度，也更具史料價值。

當初計畫簽約時，執行期僅半年，因為有繳交成果、驗收的壓力，我們必須依約交稿。之後，再與外交部商量，同意我們再進行細緻的訪問，因此實際訪問歷時兩年餘，共訪問七十次。因為非得如此，否則問不出具有史料的內容，內容就流於空洞，反覆求證的問題，不斷的對話，才有可靠性。

這本訪問紀錄共七十多萬字。陳大使不僅記憶力驚人，加上有記事的習慣，保留的記事本自1949至2004年，每天做了什麼事、接待哪些人、參加什麼會議，記得清清楚楚，甚至加貼剪報資料，方便我們整稿核對，並與他再進行對話。不過，裡頭的記事許多是法文、西班牙文，這就有賴許先生的專業才能解讀。當我們把初稿給陳大使看時，他很謹慎，根據自己的記事本、檔案又加以核對並改稿。

當訪問紀錄定稿後，外交部與本所同時進行審查，都認為內容史料豐富。不料通過審查出版時，所長陳永發認為字數太多，要求刪減為三十萬字，可讓讀者不必捧著厚厚的兩大冊閱讀。但不論如何字斟句酌，都不可能刪掉那麼多篇幅。由於陳雄飛的角色有其重要性，就他主導的與法語非洲國家建交來說，他早年留

學法國，結識許多非洲法語系國家的朋友，他們在國家獨立後都位居要津。當年我國為爭取這些邦交國，面臨兩個問題：一是跟中共的較勁，二是法國的承諾。當年為了確保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非仰賴非洲邦交國的支持不可，足見非洲友邦對我國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陳雄飛身為外交官，在第一線打仗的艱辛，過程錯綜複雜，與非洲國家的外交角力，彼此建交、斷交、復交、又斷交，不是三言兩語就能簡單帶過。很多人說楊西崑是「非洲先生」，但透過陳雄飛大使親身的見證，我們認為他才是非洲建交的先鋒，他在非洲為國家奮戰不已，比楊更值得稱「非洲先生」。

在人物的部分，陳大使跟王世杰、魏道明、黃少谷、周書楷、沈昌煥等等歷任部長，以及楊西崑、蔡維平、薛毓麒等前後任次長，外交界相關人物的業務往來關係都有所交代，也難免品評這些人物。他所見證的確實非常多元，內容精采，史料豐富，深具價值，實在是無從刪減。

2004年，陳大使不幸過世，我們將委託書給他在美國、比利時的三個兒子共同簽字，解決公開、出版的授權問題。陳大使在生前已經把自序寫好，這份稿子即將出版，目前正在校對中。之所以拖了這麼久，一方面是近史所口述史組同仁辦公室從檔案館搬遷到B棟，我和助理們放下手上的工作，花了半年的時間，整理歷年來所有口述史資料，清點、造冊、標示、裝箱，耽擱了既有的工作。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近史所陸續接了不少大型的訪問計畫，每個計畫都有執行期限和出版的時間壓力，只能優先執行這些計畫，暫時擱置陳雄飛的稿子，也就很遺憾地無法在他有生之年出版。

4. 院士的訪問

1998年4月，呂芳上所長告訴我，李遠哲院長指示，院方將提供一年的經費，由近史所負責進行院士主題訪問計畫，要我擬計畫書。當時，院士訪問的對象也包括第一屆院士，其中許多健在的院士都在大陸，包括數理組的蘇步青、黃汲清、趙忠堯，生物組的湯佩松、馮德培等等。

在主題計畫執行期間，口述史召集人是黃克武先生，爲了徵集第一屆選出的院士資料及訪問，1999年5月30日至6月19日，我奉派前往南京、上海、北京收集資料及聯繫訪問院士。早期中央研究院的檔案都在南京第二檔案館，我先在二檔館調閱院務會議、評議會議、院士會議、人事會議、預算經費、院士出身背景資料及著作目錄等，這些資料不僅可提供院士訪問參考，也是修院史不可或缺的史料。當時，呂所長寫了一封信讓我帶給二檔館的周館長，周館長同意在合作的前提下，可影印2000張，卻獅子大開口要價9萬元人民幣。我打電話向呂所長請示，他認爲二檔館漫天要價，不同意影印。後來院方在修八十週年院史時，謝國興研究員借調總辦事處期間，由他出面交涉將這批檔案掃描回來。

接著，我在6月13日前往上海，委請復旦大學書記張濟順代爲聯繫訪問蘇步青，結果蘇步青已無法談話而作罷。最後我在淮海路的新華書店購買了張元濟、蘇步青等院士相關書籍後返回南京。15日由南京搭機前往北京，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已先幫忙打電話給社科院的孫思源處長，請她代爲安排到中關村的中科院。隔天一大早我從王府井搭計程車前往中科院，孫處長爲我聯繫了文獻情報處採編組的胡雲生，他提供1955年的《中國科學

院院士畫冊》，找到部分生物、數理組院士資料。他無法讓我在他那查資料，轉介我到三里河中國科學院學部聯合辦公室找朱明安處長，影印了部分生物、數理組院士的資料。從中關村回到王府井，我到長安街新華書店購買了院士相關書籍，17日回到南京。

當我回到南京後，接到陸寶千先生電話，他要我收集已過世的柳詒徵院士資料。我在南京圖書館特藏室，經由館方的介紹，得知柳的女兒柳定生仍健在，已九十多歲，他的孫子柳曾符是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我影印了相關資料。

這些徵集回來的院士資料，連同院方逐年提供的歷屆院士資料，都由近史所口述史組同仁張成瑋、林東璟陸續按組別建檔、編目錄，方便訪問參考。

院士主題計畫執行一年後，院方希望近史所以業務費持續推動院士訪談，不用再申請主題計畫，只要同仁願意訪問，不必再提口述史委員會通過。這是院方交辦的持續性訪問。在這之前，近史所也已經對院士進行訪問，包括凌鴻勛、郭廷以、阮維周、艾世勛、蔣碩傑等，以及之後訪問的顧應昌、石璋如、李亦園等，其中艾世勛是短篇的訪問紀錄，納入口述歷史期刊，其餘都以叢書出版。

至於我參與的院士訪問有李遠哲、許倬雲、羅銅璧。其中，李遠哲是配合陳永發所長撰寫八十週年院史而訪問，未出版。後兩者都已出版，列爲近史所院士系列叢書，這兩書出版後，都曾引來風波。

(1) 許倬雲院士

2004年6月11日，陳永發所長要我與回國參加院士會議的許倬雲先生聯繫訪問，並告知由他、張力、潘光哲及我四人共同訪問。7月14日首次展開訪問時，張力因出國未參與。那次的訪問，主要是溝通訪談大綱，潘光哲提請許先生談「思與言的創刊」、「臺大的師友關係」等主題，許先生也提出學術有關中美會部分，要我們找近史所研究員楊翠華借閱他提供給她的檔案，先行閱讀，以便訪問可深入的談。

由於許先生旅居美國，訪問都是配合他回國開院士會議或擔任特聘講座期間。自2004年7月至2009年11月，一共訪問二十八次。參與訪問的除前面提到的四位外，近史所研究員張壽安、副研究員林美莉也來了一兩次。有一次，談的主題是「抗戰時期逃難的所見所聞」，不是學術對話，主訪人數卻多達六人，好像開記者會一樣。其實，主訪者眾多並不宜，否則有人喜歡發揮，提問沒有焦點，造成記錄者整稿許多困擾。通常都是一位，除非是專業領域，主訪人必須與專業者合作，最多也不超過三位。後來許先生的訪問只剩下陳永發、潘光哲和我持續完成。

許先生出口成章，擔任記錄的周維朋整稿時，完全呈現受訪者講話的語氣，沒有太多踵事增華，充分掌握整稿的原則。不過，由於許多問題需要再求證、補充，我們與許先生不斷溝通，改稿過程來來回回花了許多時間。有些內容，譬如他談到李登輝與蔣經國，數度刪除這些談話，我們認為內容很傳神，不是敏感問題，要求保留。其中，也難免品評人物，例如對李敖、姚從吾等人的批評，我們進行查證，認為無關緊要，也不是關鍵內容，就不納入紀錄。

2010年5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時，大陸記者李懷宇訪問的《許倬雲談話錄》也在同年1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許倬雲談話錄》的第五章有一段提到「李敖聰明有餘，沒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間很不愉快，因為他說謊、偷書。他把姚從吾先生房間的書偷出去，賣掉了，有一個美國的學生在街上找到一本書，有臺大歷史系圖章，送過來給我，說這是李敖賣出去的。等到李敖要畢業的時候，我不蓋圖章，所以他沒畢業。」其實，我們經過查證，李敖要畢業時，許先生已不當系主任。李懷宇的《許倬雲訪談錄》顯然有問題。

後來李敖看到這段內容後，憤而提告誹謗並求償。2013年，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民事部分許倬雲先生賠二百萬元，並須在臺灣《蘋果日報》及中國《人民日報》等六媒體刊登道歉啟事；刑事部分之加重誹謗罪尚在審理中。

這是《許倬雲談話錄》訪問過程中主訪者沒有善盡查證的後果。其實，進行訪問，主訪者必須維護受訪者的權益，否則為了取得、公開口述史料，造成誹謗官司的下場實在得不償失。由於我們態度審慎，充分查證，近史所出版的，以及授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許倬雲八十回顧》、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簡體版，並沒有前述的這些困擾。

不過，後來羅銅壁院士訪問紀錄的出版，雖也作了查證，還是引起波瀾。

(2) 羅銅壁院士

2005年11月，我與陳永發所長、助研究員孫慧敏訪問前中研院副院長，他是臺灣蛋白質化學研究的先行者。訪問五次後，副研究員胡國台也參與訪問。至2015年初，一共進行二十八次的訪問。

當時，羅先生口述習慣夾雜閩南語，當受訪者習慣以流暢的母語口述時，主訪和記錄者都必須熟悉受訪者的語言，才能溝通無礙，順利整稿。由於記錄者並不甚熟悉臺語，也就影響進度，後來又另請人再度整稿。在改稿過程中，陳永發與孫慧敏費了極大心力並進行求證。我負責出版時的校對改正，及與受訪者的溝通。

由於生化所於2016年2月19日舉辦「羅銅壁九十大壽學術研討會」，羅先生的訪問紀錄當天將要贈送與會者，我們一定要在農曆過年前完成印刷，否則來不及。我已於2014年退休，卻仍然每天到所裡，幫忙處理口述歷史尚未結案及待出版的稿件，羅銅壁訪問紀錄是其中之一。

這本書出版過程遇到很多問題，最棘手的是序文。羅先生要求近史所將訪問稿送請前院長李遠哲寫序，2015年8月，陳永發先生特別前往拜訪李院長，但李院長的序文到了2016年1月中旬都沒消息，本書內文已經印妥準備裝訂，決定不放李序。1月18日，陳永發把李遠哲的序文「亦師亦友一甲子」email給我，他說：「這個稿子我連看都不想看！妳把它送給印刷廠，要放進書裡。」

這篇「亦師亦友一甲子」反駁了羅銅壁對李遠哲的一些描述，寫作方式與一般序文不符，我認為當序文並不恰當，應該在

本書出版後，刊在近史所《口述歷史》期刊「來函照登」比較適合。但畢竟當初是羅先生邀請李遠哲寫序，試問，李遠哲院長的來稿，誰能去改動、甚至不登？如果要請羅銅壁依照李遠哲的意見，去修改「我與中央研究院」這一章，當時書已經印好，廢版重做，誰來承擔這些費用？何況已來不及，本書非得在2016年1月底出版不可！

當時，我也將李遠哲的序文寄給羅銅壁看，他看過後打電話給我，說要在自序補一句話：「感謝李院長的指正。」他的自序已經印妥無法更改，只能補印這句話貼上去。最後與印刷公司商量，序文頁數不多，廢版重印，加收六千元，不影響本書的出版，我報告陳永發先生，他也贊成如此處理。2016年1月底《臺灣蛋白質化學研究的先行者—羅銅壁院士一生回顧》交書，也趕上生化所學術研討會贈書。

農曆過年期間，近史所所長呂妙芬閱讀此書，看到李遠哲的序文，認為口述歷史書籍如此處理並不妥，事後召開口述歷史委員會做成決議，爾後口述歷史出版品通過審查後，印刷前要再找一位委員或研究員幫忙看過內容。這是不夠信任主訪者與審查人的作法。坦白講，就這個個案而言，任何人都沒辦法解決問題，神仙來看也沒輒。

很多人說，羅銅壁先生的口述歷史不能這樣子做，豈能讓前院長、副院長在同一本書裡對槓起來？其實，「亦師亦友一甲子」是《天下》雜誌前副主編藍麗娟替李遠哲寫的，對羅先生的看法，藍小姐在她所撰的《李遠哲傳》（2016年11月出版）下冊，既已提出澄清，又何必以辯駁的方式寫序文，許多人認為不妥。不過，羅先生也很有風度，他回應李遠哲的說法是「感謝李院長

的指正」。

有人說，李遠哲太愛惜自己的羽毛。譬如黃光國在《中國時報》寫了一篇〈造神運動下的浩鼎記〉，裡面提到：「羅銅壁是李遠哲的老師，李遠哲是諾貝爾獎得主，又貴為中研院院長，所以請李遠哲替他作序。不料李遠哲竟然寫了一篇題為〈亦師亦友一甲子〉的『李序』，針對羅院士對他私人操守的『指控』，寫了數千言的『澄清』。但對於羅院士的上述說法，他只是輕描淡寫地回應了兩句話：『上述羅副院長所言，據我所知並非普遍現象，只是少數所裡的問題。』在多年來『造神運動』的吹捧下，其主持人對於學術界長輩的批評也是『淡然處之』，根本不當一回事。多年來這樣的避重就輕、本末倒置，即使再多發生幾件浩鼎風暴，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除了李遠哲，前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瞿海源看到羅書對他的批評，揚言控告近史所，近史所兩位副所長大為緊張，找陳永發商談，陳永發說：「有什麼了不起？瞿海源不滿意的話，叫他寫一篇來，我們登在《口述歷史》期刊。」後來瞿先生這篇回應稿就刊載於2016年10月出版的《口述歷史》第14期。

其實，羅先生訪問紀錄出版時，我們已一再求證，也認為內容就如同黃光國所說：「他對自己一輩子在學術界的所見所聞，作了非常坦率的陳述。」但還是難免上述的問題。這就是作口述歷史無可避免的潛在風險，尤其涉及第三者，必然引發被批評者的不滿或控告。雖然如此，也不能因噎廢食，不再作口述歷史，甚至說口述歷史只要錄音不整稿，以後就讓使用口述史料的人聽聲音檔。但這引發的問題將會更多，公開聲音檔，除非經過剪裁，保留涉及第三者不妥的批評，否則對受訪者來說，傷害更

大。而且有些問題一再的求證，並與受訪者再進行對話，或是受訪者一再的重複，除非聲音檔的剪裁很有系統，否則錄音檔聽起來很辛苦。

有經驗的口述歷史工作者，都主張公開經過整理、查證、核對過的訪問紀錄，至少對受訪者的權益盡了維護，被批評者也可在開放的平臺抒發己論。這對受訪者、被批評者，是比較適切的，可以周延的解決問題，不必事事訴諸法律，浪費資源。同時，也讓使用口述史料者更為便利。

5. 曾祥和教授的訪問

曾祥和教授是我大學的西洋史老師，桃李滿天下，早期中研院近史所的同仁大都是她的學生。曾師系出名門，中央大學首屆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畢業，1946年與沈剛伯教授結褵。她教學生涯超過一甲子，不論學術界或家族網絡都有綿密的關係，確實值得口述訪問。2000年5月，旅居加拿大的近史所退休研究員王萍寫信給我，她說：「師母擬利用暑假赴美探親期間，來加拿大住到我家接受訪問，她為了準備口述歷史，已收集不少資料。」王萍是沈剛伯臺大的學生，由她訪問曾老師再適當也不過。之後，我曾航空郵寄給她訪問相關資料與贈書，並提口述委員會通過訪問。

在加拿大進行曾老師幾次訪問後，由於王萍要照顧生病的夫婿，無法繼續訪問，建議改由合適的人接手。當時，召集人黃自進商請研究婦女史的游鑑明訪問。2006年初，王萍來函詢問曾老師訪問的安排，並要我前往曾府向她致歉。我到青田街宿舍拜訪曾師，她神采奕奕，身體硬朗，很高興游小姐訪問她，但她提



2009年10月28日，沈懷玉（左）訪問曾祥和教授

出要求，希望我參與訪問並協助改稿。師命難違，因此自2008年2月25日起，我與游小姐一起訪問曾老師，至2010年5月25日，一共訪問三十次。

曾老師口若懸河，口述時就如同上課，講述的內容非常生動、有趣，學術界人物談論甚多，社會生活史也很深入，綿密的人物網絡也只有她親身經歷才能見證。

不過，在訪問過程中，曾老師滔滔不絕，有時很難插入想要提問的問題，不得不提問的結果，就是打斷了她的思緒。當她接著再談時，難免重複，這是訪問經常碰到的問題。

當訪問結束後，由於近史所同時還有其他的委託案，負責記錄的周維朋僅能陸續完成逐字稿，因此訪問紀錄尚未完成整稿，曾老師要求閱讀稿件，只能呈給她逐字稿。當她看到逐字稿時，說幾乎暈倒。我只好重聽部分錄音檔，核對逐字稿時，所講的內容的確如此，不是記錄者的逐字稿有問題。逐字稿是錄音檔的重現，所以逐字稿必須要整稿，經過整理後，比較合乎邏輯，也適合閱讀。如果曾老師看到已經整稿的初稿，應該會比較滿意。

不過，曾老師尚等待我們完成整稿時，不幸2013年4月24日在睡夢中駕鶴西歸，享年九十四歲，實在非常遺憾！之後，經由周維朋陸續整稿，2016年7月已完成初稿，目前正由游鑑明與我進行改稿、核對中。雖然曾老師無法在有生之年親自定稿，不過她很貼心，為了我們改稿無誤，生前已先寫有回憶錄，供我們參考。她的愛心與體恤，實在令人感念！這是我參與訪問，受訪者無法在生前看到訪問紀錄出版的第二位。

（三）參與委託計畫案的訪問

自1997年起至2014年，近史所陸續接受八個專題的口述史委託計畫案，包括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都市計畫前輩、九二一震災、臺灣高速鐵路建設、臺北榮民總醫院半世紀、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等訪問計畫。這些委託案都是集體計畫，執行期間，我除了擬計畫，也參與訪問、並負責交稿結案與出版，過程也是曲折。

1. 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

1997年8月起，呂芳上擔任近史所所長，在他任內推動了幾個口述歷史訪問計畫。第一個大型委託計畫來自臺北市政府，原本臺北市文獻會委託藍博洲做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計畫，但文獻會不滿意他的成果，所以交給近史所，希望由我們加以完成。

我擬了計畫書後，呂所長和召集人許文堂看過都覺得沒問題，但交給臺北市文獻會做期前審查，哪知三位審查人張玉法、張瑞德、黃富三在會議上把計畫書批得體無完膚，我又重新改訂。同時，臺北市政府的契約書有固定的範本，契約送到所裡來，所長不滿意，堅持更動契約條文。後來，臺北市文獻會的林組長、葉執行秘書特地到近史所來說明後，直到1998年2月才完成簽約。

這個計畫有一百多位受訪者，未簽約前，1997年12月底我已跟這一百多人完成電話聯繫，12月22日，同仁開會認訪，主訪者有呂芳上、許雪姬、賴惠敏、陳儀深、許文堂、黃克武、胡國台等人，等大家挑完受訪者後，沒人認訪的就由許文堂和我訪問。

我訪問了謝新傑、高明柏、林義旭、陳琴、林麗南、陳海清、吳定國、呂聰明、楊成吳、潘木櫃、吳振壽、蘇友鵬、胡寶珍、楊老朝、許貴標、簡明信、陳文福、黃石貴、楊金輝、陳錫忠、蔡國智、林榮輝、曾文華、黃玉坤、呂錫寬、陳子元、江源茂、王乃信、陳孟和、陳玉藤、蔡焜霖、林鏡明、陳景通、顏鄭來發、施顯華、吳萬福、朱華陽、廖天欣、高文章、黃祖權、劉昌富、鄭若萍、王雍澤、盧兆麟、王清圳、丁傳固等四十六位

受難者，以及陳素英、曾詹足、劉麗蓉、謝金河、黃郁文、鄭秀娟、張白鶴、張緞、王碧雲、游麗雲、曾玉靄、郭以仁等十二位受難者家屬，總共五十八人。

在訪問過程，大部分的受訪者情緒都很激動，這些首次談到隱藏在心中一輩子痛的受難者及家屬，回憶過往又是二度傷害。我們訪問時，面對無可避免的再度傷害也很無奈。但是不談這段歷史，如何徵取史料？傷感的情緒是有傳染性的，面對受訪者的嚎啕大哭，記錄者往往也跟著不斷掉眼淚，我的心情也好不到哪，但總是要穩住氣氛，遞個紙巾，轉移談一些較輕鬆的話題，並要避免有高血壓、心臟病患者過度激動。

這個計畫的期中報告和期末報告，三位審查人都予以肯定，呂所長也很高興，大家總算不辱使命完成成果。

稿子完成後要出版，出版召集人張力曾在出版社待過，有編輯經驗，他要我們自己編排插照片，教我們拿尺量比例，斜角、直角各多少，那時我們還不懂電腦插圖，簡直土法煉鋼，我與記錄鍾玉霞、林秀貞等人，每天睡辦公室加班，晚上大家輪流睡覺，不眠不休完成全書版面的編排，再交印刷廠付印。

我請受訪者陳孟和幫忙手繪綠島新生訓導處鳥瞰圖當封面，他念師大美術系，是受難者，根據自己在獄中的記憶以及照片繪製監獄位置圖，他也手繪「50年代政治案件涉嫌人臺北市內主要囚禁地點概略圖」，標示出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前東本願寺）等各單位的位置。

後來我們把照片圖說、排版稿，以及訪問過程所徵集來的資料，包括判決書等，彙整成冊交給臺北市文獻會，各自印刷出版，所以這本書有兩個版本，近史所出版的比較受重視。

2. 都市計畫前輩人物

1999年，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理事長賀陳旦到近史所，與呂芳上所長商討委託進行都市計畫前輩人物的訪問。當時口述史召集人是陳儀深，他訪問了高玉樹、辛晚教、林將財，我訪問了王章清、張維一、張隆盛。其他主訪人有呂芳上、黃克武、巫仁恕等。由於都市計畫前輩的訪問比較專業，我們與專業人士合作訪問，例如我訪問王章清是與學會的孫可立、王雪玉一起訪問。不過，訪問過程中，其中一位專業人士大談自己的專業，談了半個鐘頭以上，變成受訪者只聽、沒談，我只好技巧性的引導，讓受訪者進入主題，談他的專業，而不是角色顛倒。

《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出版後，頗受肯定，都市計畫學會特地在臺大校友會館舉辦新書發表會，理事長劉玉山還頒發獎牌給近史所，學會更出資加印五千本，指定給逢甲大學等有都市計畫課程的科系當教材。不過，都市計畫畢竟是比較專業的領域，近史有位同仁的先生是建築師，她說：「就專業來看，本書內容不夠專業。」她認為，專題式的口述訪談，主訪人專業不足，給專業人士看，顯得不夠水準，但讓一般讀者看的話，卻又太高深。由此可知，專業性口述歷史的困難度滿大的，雜音也很多。

3. 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計畫

1999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李遠哲院長擔任「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召集人，指示近史所進行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計畫，我協助擬計畫，由召集人陳儀深主持計畫，邀請所際間不同領域的同仁參與，譬如民族所余安邦、臺史所黃蘭翔，近史



2001年7月19日，沈懷玉（右）訪問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副執行長吳聰能

所則有呂芳上所長、謝國興、陳慈玉和我，從2000年開始進行訪問，2001年結案並出版。

我訪問的對象有十七位，包括：中央政府層級營建署副署長柯鄉黨、重建會副執行長吳聰能。鄉鎮層級有鹿谷鄉長陳錫梧、埔里鎮長張鴻銘。宗教團體有基督長老教會羅榮光、張德謙，臺灣社區關懷協會黃肇新、世界展望會執行長尤明彥、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夏忠堅牧師、天主教聖母聖心會朱南子修女。醫療機構有鹿谷農民診所醫生曾孝明、竹山秀傳醫院院長謝輝龍、埔里基督教醫院院長黃蔚；從重建的角度來看，醫院本身是受害者，卻也要參與救難。

公益服務社團有綠色陣線協會伏嘉捷、吳姿瑩。建築專業團隊是臺大城鄉所林建元教授，以及謝英俊建築師。

本書出版後，2009年，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要與教育部合辦「經驗傳承，從心出發—921地震十週年紀念暨檔案特展」，來函院方請提供資料。結果院方承辦的秘書組送來急件，批示交一套口述歷史叢書，顯然是錯誤，我認為應該是提供檔案資料才對。由於辦展時間急迫，我找出資料提供對方後，才如期展出。2010年初，研考會主委朱雲鵬來函近史所要求獎勵支援特展者，我將公文呈給召集人楊翠華，她批了為我敘獎，但副所長卻批無敘獎必要，最後黃克武所長批示「嘉獎一次」。這是我參與九二一震災口述歷史之後的插曲。

4. 臺灣高速鐵路建設口述訪問計畫

2004年8月，臺灣高鐵公司協理賈先德到近史所洽談委託口述訪問計畫，陳永發所長、張力副所長要我擬計畫及契約書。12月21日，主訪者所長、副所長、召集人黃自進、陳儀深、許文堂、孫慧敏以及我、還有擔任記錄的助理，到高鐵公司與董事長殷琪座談、溝通訪問意見。接著我擬了二十五頁的綱要，每位主訪人都可以摘取題目展開訪問。我參與訪問的受訪者有蔡明忠、林天送，並與陳永發合訪殷琪、李國雄，和陳儀深合訪賈昭義。

訪問殷琪時，陳所長老是搞不清楚什麼是「政府零出資」，殷琪得解釋個老半天。計畫執行期間，高鐵公司仍在興建，新聞不斷，尤其募資、融資的問題，地層下陷，機電系統等，引發不少批評與爭議，是媒體報導的焦點。陳所長說他不要替高鐵公司

背書，所以殷琪只訪問一次就停了下來。

這個計畫的執行期限是一年，高鐵提供經費一百萬元，但沒有交出成果報告，自然不會有尾款進帳。院方經常打電話來問：「你們什麼時候結案？還有尾款十萬元沒進來。」後來高鐵公司下了最後通牒，如果我們再不交成果報告，他們就要再委請中視記者沈依婷去做。陳永發說：「十萬塊的錢進不來，我出好了！」行政程序上，必須是高鐵公司把十萬塊支票匯到中研院，再由院方把錢撥給近史所才對，不是個人拿十萬塊去墊就可以了事的。

後來我想再約殷琪做訪問，高鐵公司說：「我們董事長不接受訪問了！」那如何交稿？實在沒辦法，我請口述史組助理幫忙，透過聯合知識庫搜尋高鐵相關新聞報導，列印給我，我花了很長的時間閱讀、整理、歸納，把高速鐵路建設過程中，從中華高鐵公司（劉泰英、胡定吾）、臺灣高鐵公司（殷琪）雙方角力競標的過程，以及臺灣高鐵公司得標後，所遇到的募資及融資問題、系統問題，車廂採購問題，一一鋪陳出來。包括行政院長謝長廷指示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挹注高鐵、殷琪在新都里餐廳與李登輝總統吃飯等，我看了資料後，對新都里懷石料理很好奇，還特地找一天去品嚐一番，新都里位於建國北路，料理很棒，景觀非常好。

我把高鐵建設的過程寫得非常清楚，譬如：工程界有個不成文的習俗，隧道工程進行時，忌諱有女性在場，但2001年5月，殷琪邀請交通部長葉菊蘭到新竹寶山鄉參加高鐵C220標冷水隧道工程貫通儀式，這是高鐵首座完成貫通的隧道，她們都戴著安全帽進入工地，打破傳統禁忌。

高鐵的迴龍、林口、湖口三個隧道必須開鑿豎井，以便發生

危難時，乘客可以從豎井逃生。但是有個隧道口的斜度太大，導致高鐵列車快速駛過時，乘客的耳朵就像搭飛機一樣，有耳壓的不舒服現象，我每次搭高鐵經過這個隧道口，耳朵都很不舒服。還有，高鐵沿線的雲林西螺、二崙、土庫、元長、虎尾、北港一帶地層下陷，並有「差異沉陷」的問題，興建時以技術解決問題，在墩柱與軌道大樑間裝了「把盤式支承墊」。當時，高鐵通車，消基會還呼籲大家抵制高鐵，因為坐起來像雲霄飛車。其實「把盤式支承墊」有五公分的彈性空間，而且這個地區的地層下陷是整個面下陷，不是單點下陷，所以不會發生雲霄飛車的情況，事實證明，高鐵通車至今這麼多年，也沒發生這類問題。

我把結案稿件交給高鐵公司，他們的專員、處長、律師、歐晉德、殷琪等人看過，負責跟我聯繫的陳明澄高專說：「怎麼寫得這麼詳細完整？比我們知道的還多。」之後高鐵公司就將尾款撥給中研院，陳永發所長在口述歷史委員會感謝我把這個案子完成。

雖然計畫圓滿結案，由於我在殷琪的稿件裡添加了太多東西進去，這樣的內容已經不是口述歷史，但當時只能這樣做，不然怎麼辦？現在這個計畫的稿件只能存檔。臺灣只有一條高鐵，不可能再有第二條，這是國家重大建設，期盼將來殷琪願意再受訪，回顧、補充未談完之處，並且能有出版的機會，為國家留下重要的交通建設口述史料。

5. 兩個榮民總醫院院史訪問計畫

臺北與臺中榮民總醫院院史口述訪問是研究員游鑑明主持的計畫，我協助擬定計畫，簽約後，游小姐邀請同仁與研究醫療史

的張淑卿、劉士永（僅參與臺中榮總的訪問）共同參與訪問。訪問對象都是兩院事先徵詢與聯繫。

2009年執行「臺北榮民總醫院半世紀一口述歷史回顧」時，由於受訪對象是醫生與專業人士，在訪問之前曾舉行座談，達成共識後再展開訪問。我負責訪問的是心臟內科、任過院長的張茂松，眼科醫師曾任副院長的劉榮宏，以及麻醉科醫師王學仕、病理科主任江宏、資訊室主任唐大鈿。

2012年展開「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一口述歷史回顧」計畫，我補訪羅光瑞、彭芳谷、楊大中三位院長，訪問蔡養德、吳天成兩位副院長，以及神經內科賈力耕、感染科劉有增、胸腔外科王丕延、一般外科劉自嘉、放射科楊建芳等醫生，及工程室主任鄭定乾。

我參與這兩個醫院院史的訪問，碰到的問題，以臺北榮總為多。記得我與記錄柯小菁到臺北榮新診所訪問張院長，從早上九點談到下午將近三點，中間未曾休息、喝水或上洗手間，原來醫生因職業關係，都練就這樣的本事。所以訪問除了準備專業領域的訪問題綱、提問問題外，也要有耐力與體力。張院長除了談他的專業外，對院長任內密帳案被判刑也侃侃而談，澄清了外界的報導，但出版時院方堅持刪除，實在有違口述歷史精神。

劉榮宏醫師的訪問談了幾次，記錄周維朋完成不錯的整稿，改稿過程劉醫師以操手術刀的專業，要求精準，一個字都不放過。王學仕醫師由於重聽，訪問過程我筆談、他口述，林東璟記錄，這是訪問特殊對象的變通辦法。江宏醫師從下午兩點談到晚上十點半，晚餐邊吃邊談，不過整稿可苦了記錄張成璋。唐大鈿談的是醫療資訊專業，稿件來來回回改了二十多次，我閱稿、改

稿，記錄林東璟也不厭其煩地在電腦上修改。我們完成的整稿，陸陸續續由臺北榮總陳素貞組長送請各科專家閱稿並改訂。

不過，出版之前，通過審查的訪問紀錄，林郁芳院長認為涉及「元首醫療」及相關人士對臺大醫院的品評部分，好像新聞報導，邀請我們前往座談、溝通，要求調整，以免影響爭議。近史所由陳永發所長領軍，黃克武、口述史召集人楊翠華、計畫主持人游鑑明與我一起參與座談。其實，臺北榮總肩負元首醫療任務，我們的計畫書主題也包含談元首醫療，訪問當然要問。曾參與元首醫療的羅光瑞、彭芳谷、姜必寧、楊大中、劉榮宏、王學仕、李德馨、管玉貞、俞瑞章、譚柱光、陳光耀等醫師在訪問中所談的都是他們的親身經歷與見證，基於醫療倫理，公開患者病史雖有所不宜，但元首是公眾人物，十幾位醫師在蔣公過世已三十幾年的首次精采見證，內容已不涉及醫療隱私，而且具有其史料價值，也有別於新聞報導。後來曾有博士生根據這些史料做了論文。至於臺大與榮總的門戶之見也是公開的事實。這些問題都不涉及名譽誹謗或隱私，刪除其實沒必要，因此都予以保留。

6. 兩蔣侍從人員訪問計畫

蔣中正、蔣經國總統侍從人員的訪問是黃克武所長主持的計畫，我負責擬計畫書。其中，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是因為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之前的委託案無法出版，2011年再委請近史所另行訪問。蔣中正侍從人員中，我訪問了機要秘書王正誼、蔣孝肅，內衛組副組長應舜仁，座車侍衛官鄭敦浦，侍從副官張欣超，侍衛樓文淵，警衛隊長朱恆清，攝影胡浩炳。這八位受訪者除胡浩炳是江蘇蘇州人外，其餘都是浙江人，口述時浙江口音很



2011年10月1日，沈懷玉（左）訪問前人事行政局局長兼蔣中正總統機要秘書王正誼

重，不習慣浙江話的記錄，整稿很辛苦，必須重複一再的聽，還是難免文字記錄的錯誤。

此外，有位同仁問了受訪者許多生活細節，記錄全都錄，這位受訪者看到瑣碎的紀錄傻了眼，拿了稿子找上我幫忙。為了繳交成果，我花了一個多月改了一篇讓他同意簽委託書的訪問稿。其實整稿並不是有言必錄，無關緊要、重複的內容、口頭語等影響文字順暢部分都不應納入整稿中。

進行訪問同時也應徵集照片相關資料，侍從人員的集體訪問對近史所研究同仁而言，無論做多做少，都不納入研究成果，參與訪問是拔刀相助，有的人訪問大功告成後，也不在意是否徵集

了資料。爲了繳交成果及出版，我必須挨家挨戶向受訪者重新徵集。還好，我訪問的胡浩炳，他的叔父胡崇賢是御用攝影師，保留許多蔣中正相關照片，沒有照片的部分，向他商借掃描，解決了繳交成果與出版的問題。

《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完成後，中正紀念堂舉辦「那些年，我們隨侍蔣公的日子—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口述史料特展」，這是口述歷史的附加成果，中正紀念堂使用我們徵集來的資料，在現場放錄音帶，原音重現，並展出照片和稿件，這是非常好的活動。

2012年，《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出版後，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朱雲漢商請黃所長主持「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計畫」。2013年展開訪問，我訪問了醫官姜洪靈、空軍武官葛光越、陸軍武官章以明、安全參謀官池蘭森、副組長許長勝、座車侍衛官李祖怡、侍從攝影官高雉偉、參謀劉久偉、侍衛官卓士旺、警衛官劉載順、楊彼德。我退休後，2015年朱執行長再邀我與黃克武、張力合訪宋楚瑜。

在訪問之前，前侍衛長吳東明，以及邱奕和、胡鎮球曾到近史所與同仁座談，他們認爲以前我們訪問蔣中正的侍從人員，也談各自的生命史實在不宜，要求我們訪問蔣經國的侍從人員，應以經國先生爲主，個人部分少談，還要求所有受訪者都要一致，對侍衛體系不能談錯。其實，口述史料的徵集宜多元，雖然談的主題以經國先生爲主，但個人生命史也不能忽略，否則無法瞭解這些人是如何進入七海侍衛體系？我們訪問多年，已有經驗，當然以我們的方向進行訪問。記得2013年3月29日，我到新竹訪問楊彼德時，胡先生一通電話打到楊家，楊先生向以前的老長官



2015年4月24日，主訪者黃克武（左三）、張力（左二）、沈懷玉（左一）訪問宋楚瑜（左四）

一五一十稟告談了哪些內容，這是干擾主訪者的訪問、主導受訪人的談話，實在很不宜。

當訪問紀錄完成要交研究成果時，許多篇沒照片，我又得想方設法自李祖怡先生借給我的光碟，從數千張照片中，反覆看了數十次，一一辨認每位受訪者，總算爲他們找出與經國先生有關的照片。

還有，通過審查的訪問稿，出版之際，曾到所裡來座談的胡先生，強調口述侍衛體系不得有誤，結果我核對資料，除了發現他的錯處，多篇也有問題。本書口述對經國先生的近身觀察，個人儘可各說各話，但談侍衛體系，有其演變的事實，要求史料準確，主訪者有查證、受訪者有講對的責任。

(四) 近史所同仁的訪問

1. 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

2003年，爲了配合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2004年），及近史所五十週年慶（2005年），陳永發所長擬邀請郭先生的門生故舊進行口述歷史，回顧郭所長創所的艱辛，以及南港學派的成就，兼口述個人經歷與學術生涯。

我訪問的十位受訪者，包括近史所同仁王萍、李恩涵、魏秀梅、周道瞻，曾在近史所服務的賈廷詩、郭正昭、賴澤涵，還有郭先生在師大的同事賀忠儒，以及郭先生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學



2003年10月27日，沈懷玉（左）於東海大學訪問賈廷詩教授

生，當年他們留在大陸，沒到臺灣，分別是王覺非、劉敬坤，他們都肯定郭廷以在學術上的貢獻。

這幾位受訪者當中，在美國的郭正昭、北京的劉敬坤、上海的王覺非，我都是透過電話訪問錄音。

李國祁先生訪問紀錄談到，郭廷以本人對於社會、經濟的問題，不如他對政治、外交、軍事、人物、思想研究來得有興趣。但郭正昭說，郭所長晚年很重視經濟，譬如郭廷以曾經寫張嘉璈年譜，並且談他怎麼創辦銀行，主張建立中國的金融體系，強調銀行是經濟發展的動力。郭廷以跟何廉的交情很好，他很敬重何廉，何廉是中國最早主張市場經濟的人。郭正昭談到郭廷以晚年這樣的觀念，可以補李國祁說郭廷以不重視經濟的內容。

周道瞻的訪問滿特別的，我們訪了六次，他不接受錄音，因爲他有情治單位恐懼症，我只能盡量記錄。周道瞻以一個管人事的秘書身分，說出對郭廷以的深刻近身觀察，也談出所裡很多密辛。

這本訪問紀錄出版之前，陳所長與副所長沈松僑都仔細地閱讀，結果認爲李國祁、張朋園、李恩涵、林明德四篇問題最多，必須等問題解決後才出版。這些問題是涉及對同仁的批評，但都是個人的經歷與見證，經過溝通，有的有所保留。2004年出版《郭廷以門生故舊憶往錄》，除了訪問紀錄外，也收錄了七篇自撰稿。

2. 近史所一甲子

近史所創所即將一甲子時，黃克武所長邀請資深同仁接受訪問，回顧在近史所的種種，兼記錄個人生命史，也邀我談近史所

的口述歷史。由於我即將退休，許多名下的工作都未了，無暇受訪，也無法自撰一篇。不過，接受訪問的王爾敏教授卻指定我訪問他，王教授雖眼睛視力不佳，幾近失明，書寫困難，還自加拿大寄來親自撰妥的相關資料供我參考。爲了準備訪問，我也上網收集有關他的資料，並閱讀他的二十餘種著作，擬了訪問綱要。

由於王教授旅居加拿大，2013年9月25日、11月19日，我透過越洋電話錄音訪問兩次。整稿有疑問，並不時電話溝通、請教，完成訪問紀錄後，初稿寄請他的女公子讀給他聽，經斧正後定稿。

一般口述歷史都是主訪者當面訪問受訪者。目前資訊進步，遠距離的訪問也可以電話、視訊進行訪問錄音。我進行的幾次電話訪問，都達成不錯的整稿。

3. 近史所口述史網站

近史所的口述歷史進行了將近一甲子，召集人游鑑明認爲必須建置網站。2010年2月起，我根據之前已蒐集的資料，又花了三個多月時間，再蒐集及撰寫網站資料，同年6月10日連線上網，並與國內、外做口述歷史的重要單位連結。透過網站，可瞭解近史所口述歷史工作概況、訪問紀錄出版那些書、同仁發表了那些口述歷史相關論著等等。同時也可進到連結的網站，瞭解國內外口述歷史相關信息。2016年進行改版的網站，比我之前做的又更精簡。

(五) 溫哈熊訪問紀錄風波

有關溫哈熊官司案，我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

例》的幾篇文章已提到，不再重述，下面談的主要是我參與處理這件事的經過。

1997年12月初，《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出版時，《中時晚報》副主編林馨琴自本所取得該書後，摘錄有關章孝嚴部分，轉發各大報，6日媒體大篇幅報導。呂芳上所長與出版召集人張力都認爲媒體報導後，本書才會暢銷。不料這樣的報導，讓甫接國民黨秘書長的章孝嚴大感不滿，一狀告到中研院院長李遠哲處，要求取消近史所的口述歷史。當時，李院長交由副院長楊國樞處理此事。所長向副院長解釋原委後，告訴我事態嚴重，要我準備資料以備答辯。接著打電話向溫哈熊致歉，並向《中時晚報》林馨琴聲明，不得再刊登連載溫哈熊相關內容，已登載者補辦同意書及付稿費。

由於溫哈熊訪問紀錄涉及批評的人、事不少，各大報仍摘錄報導，副院長在9日發表聲明，要訂口述歷史規則。其實，近史所推動口述歷史時，早就訂有訪問辦法等相關規定。我前面提到，口述歷史難免有潛在的風險，無論如何防範，還是免不了擦槍走火。後來又有陳長文的理律律師事務所來函向李院長抗議溫書對他的批評。最後以「來函照登」方式刊載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這些風波之後，餘波仍未了。2001年6月4日，呂所長告訴我，俞揚和堅持要控告近史所，要我找出委託書、審查意見表、口述史工作程序表給他。我看當天《中國時報》的第一、三版都報導俞揚和、蔣孝章擬控告事，晚間各家新聞節目也都報導此事。隔天所長告知準備8日到溫府談有關法院開庭事。

6月8日，我準備了一籃水果，與所長及召集人陳儀深前往

溫府拜訪。陳先生擬了一份聲明書，原本要給溫哈熊簽字，聲明他願意為本書所說的每一句話負責。這是在我本書出版之前，與溫先生電話溝通時他的承諾，他也曾向前召集人許文堂做了同樣的承諾。但談話中，溫先生對俞揚和來信辱罵他感到很不滿，他對近史所答應俞揚和所開條件沒意見，並表明書中所言當初是應劉鳳翰訪問時所談，他希望能和解。而且手中並沒有甚麼第一手資料，因此要他簽聲明書，時間不對、也不妥。

6月10日，俞揚和、蔣孝章委託的律師王清峰召開記者會，再度揚言要告溫哈熊及近史所。10月18日，俞揚和對近史所索賠100萬美金。呂所長要我蒐集談有關蔣孝章、及口述歷史學術價值的文章，並要我在12月18日將溫哈熊案原委寫成報告。經過十幾天挑燈夜戰，溫案報告書與張瑞德副所長提供的美國有關公眾人物被批評提告的判例，併在一起作為答辯狀，呂所長又三度改動本稿並附上我收集的附件交院方律師。

2002年1月初，溫案開庭，近史所先後被傳出庭作證的有溫哈熊進行訪問期間的所長陳三井、主訪者劉鳳翰、前召集人張力、我、以及審查人陶英惠、陸寶千。2月25日，我到臺北地方法院出庭作證時，法官說如果我所言不實，視同被告。法官問話時紀錄立即顯示在電腦銀幕上，我一面答話，還要我仔細看銀幕的紀錄。

當時，法官、雙方律師交相質問，我被問的時間將近一個鐘頭，是所有證人中被問最久的。王清峰律師就我交給陳三井先生的記事提出問題，溫哈熊的律師也就此一一提問，主要問我：1997年10月23日，我曾打電話告知溫哈熊有關審查人「對時人批評甚多」，請保留之問題。我說：「這都是依照程序來處

理，審查人有意見，必須知會受訪者，請其參酌是否修改。」律師並問我的記事是否底稿？我的記事當然是底稿，但怎麼會落入律師手中？原來是我提供給陳三井先生出庭作證參考，律師向他要去做影印的。

接著，我強調口述歷史只是史料，不是定論，除了溫書提到蔣孝章、俞揚和的婚姻外，坊間許多著作也提到蔣經國為此事大為震怒、蔣宋美齡出面勸解的事，甚至蔣緯國接受訪問也提到。王清峰律師說：「那是否傳蔣宋美齡出庭作證？」法官大概根據我們所提的附件、陳述，也認同溫哈熊口述蔣孝章、俞揚和的婚姻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故意誹謗，怎麼可能傳蔣宋美齡出庭作證？

最後，王清峰又問我：「何時到溫哈熊府上？」我說：「6月3日與呂所長、陳儀深一起去。」溫哈熊在庭上卻說他不認識我，我也沒到過他家，真令人氣結！至於他說過對每一句話負責的事大概也忘記了。

其實，到溫府的時間我記錯，應是2001年6月8日，因為記事給了陳三井先生，不在手邊，哪料到出庭作證會問這些？後來，溫的律師在2月27日（2002年）早上打電話給我，說：「溫先生的記事簿記有6月8日你們到他府上，我們會向法院提出更正，說你確實到過他家。」並向我致歉。

2002年3月25日，陶英惠、陸寶千出庭作證時，他們很不諒解，何以審查報告會落入王清峰律師手中？當庭表明擬提告洩漏審查報告者。這些東西都是當初法院來函要求近史所提供。

同年4月12日，溫哈熊案法院宣判無罪。5月1日，俞揚和、蔣孝章分別在《聯合報》、《中國時報》聲明不擬再上訴。這

起官司風波因此了結，近史所也就不必賠他們 100 萬美金。

(六) 參與人員培訓

1999 年 5 月 26 日，呂所長告訴我，要與研究同仁許雪姬、謝國興、張力、黃克武等人商討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中國近代史學會贊助近代史研究所等辦理口述歷史研習營事，要我擬計畫、編預算。由於月底我必須前往南京、上海、北京蒐集有關院士訪問資料及聯繫訪問人選，出發之前我將計畫擬定、預算編妥。

當時，許雪姬教授認為臺灣口述歷史蓬勃發展，但許多從事口述歷史工作者所作的並未必正確，有必要辦理研習營，培訓有志口述歷史工作者。同年 8 月 6 日至 27 日，分南、中、北、東四區分別舉辦，承辦單位是近史所，南區由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協辦，中區由私立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協辦。各區學員五十至七十名不等、培訓三天，除授課外，並安排受訪者讓學員親自訪問，講師帶領講評。我幫忙編手冊、學員招生、聯繫講師課程，及負責成果撰擬外，在南區、中區也主講了「口述歷史與專史之纂修：以白色恐怖為例」。

這次研習營舉辦之後，反應良好，2000 年 8 月 16 日至 21 日，又由近史所承辦了兩梯次的進階研習營，培訓六十一名學員。進階班我僅負責研習營活動，未授課。

2002 年，屏東縣六堆文化研究學會為了培訓六堆客家地區口述歷史人才，7 月 4 日，我受邀為學員講授「口述訪問稿與資料的整理」。同年 9 月 27 日又至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舉辦的護理人員口述歷史培訓，講授同樣的課程。

2004 年，檔案局在政大公企中心辦理檔案管理基礎班訓練，10 月 30 日邀我講口述歷史，我講了「國內外檔案館與口述歷史」。

2006 年 1 月 14 日，臺北市文獻會邀我任第八期志工基礎培訓課程講座，課程六個鐘頭，我分別講授「口述歷史在臺灣的發展」、「口述歷史訪問的準備工作」各三個小時。

2008 至 2010 年，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主辦三期的「威權時期政治案件受難者訪談計畫」培訓工作坊，中研院社會所吳乃德教授邀我講授口述歷史，我先後講了「口述訪問稿與資料的整理」、「口述歷史實務、應用與省思」。

由於近史所的口述歷史成果頗受重視，聖約翰大學為了修校史，擬對早期的校友進行口述歷史，委請近史所為他們參與主訪的人員講授口述歷史。2012 年 3 月，召集人游鑑明邀張力、陳儀深及我共同授課。同年 11 月，廣東汕頭大學為了進行職業婦女訪問人員的培訓，到近史所請游鑑明主持訓練，她邀了許雪姬、張力、謝國興、陳儀深、侯坤宏、陳進金以及我授課。

2013 年 8 月，澎湖縣政府文化局舉辦「澎湖縣地方文化館暨博物館人才培訓口述歷史工作坊」，邀許雪姬教授與我為學員講授口述歷史，並在座談會中講評學員的口述歷史實作。

此外，張秀蓉教授在師大開「科學教育研究特論」，邀我為她的學生講授口述歷史，我在 2005 年 11 月 19 日講「口述歷史訪問技巧」、11 月 26 日講「整稿藝術」。銘傳大學洪德先教授於 2008 年 10 月 24 日，邀我到該校通識教育中心臺灣史專題講座，講授口述歷史，我講完之後，有位老師要求把我的 powerpoint 講綱留給她，以便以後授課參考。呂芳上教授在東海

大學開設口述歷史課程時，也邀我為學生講口述歷史。

參與口述歷史國際研討會

2004年，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在山東省煙臺市召開「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國際學術討論會」，除了大陸學者外，也邀請日本、臺灣專家學者與會，我和國史館卓遵宏受邀參加「口述史料和報刊史料研究組」，我發表〈口述史料的價值與應用〉，卓遵宏發表〈側觀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與在臺發展〉，各組討論結束，要派代表到大會報告，我被口述史組推派為代表。後來這篇文章收錄在2005年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也刊在南京大學的《民國研究》總第八輯。

2006年8月，當代上海研究所舉辦「首屆海峽兩岸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受邀參加的有：近史所張力、游鑑明、我；臺史所許雪姬、鍾淑敏、詹素娟。我發表兩篇文章〈口述歷史在臺灣的發展〉、〈口述歷史實務談〉，之後收錄在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來自海峽兩岸的探討》。

2006年年底，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野本京子教授邀我到該校參加會議及演講。我與她素昧平生，2005年12月底，她與助理教授河路由佳、研究生謝佳玲來找我，我送她兩篇發表的口述史文章，她們也在進行二戰期間日本佔領地的口述歷史，有的是委託當地人訪問。談起口述歷史碰到的問題大同小異，當時她說要安排我到該校演講，我沒答應。隔年2月21日，她再來函邀

請，之後透過謝佳玲幾次電話聯繫，並寄來邀請函、機票，邀我在2006年12月15至19日前往該校參加「亞洲、非洲史資料學的現狀與地域文化研究國際研討會」。這次大會，尼泊爾、孟加拉來的兩位學者報告了他們所做的口述歷史。我在18日以「口述歷史的徵集、運用與困擾」為題在小會議室演講，大綱事先由謝佳玲譯為日文，我報告時，由她同步口譯，所以講了三個鐘頭。後來這篇文章發表在2009年出版的《史學與史識—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論文集》。

2012年10月，澳門理工學院舉辦「眾聲平等：華人社會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許雪姬教授推薦我參加會議。她在大會以〈臺灣口述歷史的回顧與展望〉做專題演講，參加會議發表論文的還有臺史所劉士永，臺北醫學大學蔡篤堅，臺北市文獻會翁誌聰，國史館侯坤宏。我發表的文章是〈口述歷史延續性問題處理藝術〉，主要談資料徵集碰到的困難，以及整理、出版和智慧財產權的問題。這篇文章收納在2013年澳門理工學院出版的《眾聲平等：華人社會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

從近史所退休

1995年左右，研究員魏秀梅跟陳三井所長說，我已發表了數篇論文，建議讓我轉為研究系統，他也答應。後來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

前面提到外交部委託的陳雄飛訪問計畫，因經費僅半年，這本列為政務類第一期計畫的訪問紀錄尚未完成，我到外交部調閱

檔案時，黃科長要求我們做「中日關係—外交檔案叢書：政務類第二期計畫」，再補助經費，完成訪問紀錄及選編自中日和約簽訂至斷交的檔案。這是大部頭的工作，但還是必須要接計畫。因為當時借調、影印外交部檔案極為困難，接受委託案，不僅有影印的便利，也可開拓同仁的研究領域。同時，也解決口述歷史助理的薪水問題。我擬了計畫、簽約之後，由研究中日關係的研究員黃自進主持計畫，我跟他共同合編。後來繳交了口述史組助理王景玲、簡佳慧、周維朋、林東璟、張成璋協助輸入的中日和約成果予外交部結案後，尚待完成的部分，黃先生仍持續在進行。

我到外交部閱覽中日關係檔案時，發現 1952 年中日和約約本的原件，外交部長葉公超和日本外務大臣河田烈的簽名，是簽在朱紅色的陶土並黏在約本上，印象特別深刻。當時研究員林滿紅也很關切中日和約，我告訴她這個信息後，她希望能取得原件的掃描檔。我與外交部聯繫，同意掃描後，2006 年 6 月 22 日，由資訊室同仁林哲銘協助，將中日和約中華民國及日本的約本正本及附件 A、B 全數掃描，提供林滿紅。後來，她寫了幾篇以中日和約討論主權的論述，寄給馬英九先生。2008 年 5 月，馬英九就任總統後，聘她擔任國史館館長，希望她對中日和約多所著墨，2009 年，國史館在臺北賓館舉辦中日和約特展。

林滿紅接任館長後，透過卓遵宏跟我談了很多次，希望我到國史館擔任協修，也幫忙中日和約等事。我通過考試院簡任升等考試，近史所並沒有簡任缺，魏秀梅女士非常關切，也請王爾敏教授向林館長推薦我到國史館。當時，因為許倬雲、臺灣高速鐵路、陳雄飛、臺北榮總半世紀、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等訪問紀錄尚待出版或結案，我跟林館長表達，等忙完這些案子再到國史

館。卓遵宏跟我說：「幫妳保留協修的職缺，希望近史所的工作告一段落後就過來。」後來林館長於 2010 年 12 月辭職，此事便不了了之。

2011 年 5 月，呂實強老師到辦公室找我，他認為我未能轉到研究系統未免可惜！同年 9 月 5 日，呂老師不幸車禍往生，他的一再關懷讓我感念不已。

我於 2014 年 7 月 15 日自近史所退休。由於黃克武所長要我協助完成《「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的出版，同時還有我參與訪問的《臺灣蛋白質化學研究的先行者：羅銅壁院士一生回顧》、《外交生涯一甲子—陳雄飛先生訪問紀錄》、《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必須完成出版，仍每天到所裡幫忙，直到 2016 年 6 月，前兩書出版後才離開，後兩書則在家裡繼續做。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務的參與

2009 年，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創立後，我被選為第一、二屆理事，2013 年更名為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後，被選為第三、第四屆常務監事。

2015 年，學會接受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委託，進行首任總臺長楊厚明先生的訪問，理事長許雪姬說，原擬接計畫者不接了，問我是否可以幫忙？我接下來後，同年 6 月 8 日開始進行八次的訪問。

飛航領域非常專業，除了飛航服務總臺及楊總臺長提供的資料外，我也蒐集、閱讀不少資料。我完成訪問紀錄後，因楊總臺

長視力退化，初稿的字體放到最大讓他修改，有時我還必須再到楊府，把稿子唸給他聽進行改稿。定稿之後，我插入照片排版，由口述歷史學會通過審查後，將成果繳交飛航服務總臺。楊總臺長非常滿意訪問紀錄與彩色版面的排版，要求多印幾分讓他送親友。我徵求委託單位同意後，自費印給他數十本。

我交給飛航服務總臺的成果，雖然學會已通過審查，他們也找了兩位審查人再度審查，還要我出席會議說明，再度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完成驗收後，經費才匯到學會。

除了訪問之外，2014年由學會出版、理事長許雪姬主編的《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我也寫了〈口述歷史的倫理問題〉、〈訪問技巧、語言、情緒與敏感問題的處理〉、〈口述訪談後的整稿問題〉、〈口述歷史延續性問題處理藝術〉四篇文章，及兩篇納為附錄的〈世界各國口述歷史機構相關資訊〉、〈臺灣口述歷史機構相關資訊〉。

2014年及2015年，許理事長接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主持「臺灣白色恐怖專題」口述歷史工作坊、口述歷史進階班工作坊，我受邀擔任協同主持人及學員導師，協助培訓學員訪問、以及改稿與講評。

口述歷史的困難與期許

(一) 口述歷史的難題

我做口述歷史多年，學了很多，不僅從受訪者處體會了人生，因訪問關係，需要廣為閱讀，多方請教，也增廣許多見聞、

不斷累積許多知識。同時，也深刻體會工作所面臨的問題，例如涉及對第三者的批評，雖已經小心查證，謹慎處理，認為不會有問題的，結果還是發生問題、必須面對解決。例如我們已經有溫哈熊官司案的教訓，後來還是難免羅銅壁問題的發生。我們必須認知，口述歷史潛在風險的威脅，過去、現在、未來都會一樣，不只是臺灣，國外也有同樣的問題，這是一個無可避免的進行式。

從主訪者的角度來看，訪問的對象是多元的，包含各領域，經常面臨不熟悉的專業，許多專業的知識都必須去瞭解，例如進行高鐵訪問之前，我曾前往拜訪高鐵路局長，及資訊相關人員，他們不僅提供專業相關資料，也告訴我一些專業術語。如果事先沒做功課，就無法跟受訪者對話，也沒辦法進行深度的訪談。

若從受訪者的角度探討，會發現有些受訪者的談話內容很平淡，做出來的稿子無法出版，像前輩張朋園先生訪問前內政部長沈鴻烈，他說有些問題受訪者避諱不談，如果找一些資料寫上去，那就不是口述歷史了。他在《近史所一甲子》裡說：「當我們將訪問紀錄完稿交給他審閱確認時，他卻將原先約十萬字左右的白話文改成僅一萬字上下的文言文，使得訪問紀錄中的許多問題變成相當隱諱模糊，模稜兩可。」我所碰到的經驗也是如此。

有些受訪者拿到初稿後，竟然自己寫了一本回來，譬如楚崧秋、胡炎漢。不過，前者還是要求以訪問紀錄出版，後者則納入近史所的回憶錄系列。

除此之外，口述歷史出版品還面臨版權的問題。口述歷史結案成果，屬於委託機構及受託機構共同持有，不是出資的委託機構獨有。至於出版的版權問題，以中研院近史所為例，都是接受

委託計畫後，並完成該書的編輯與出資出版，因此碰到版權有爭議，院方都強烈主張擁有著作權與財產權，如《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的出版，我曾經跟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爭執過，也請中研院的律師幫忙，最後近史所爭取到版權。有了這次經驗，之後與臺中榮總、振興醫院簽署委託計畫契約，都約定由近史所出版，並擁有版權，再致送委託單位需要數量的贈書。

(二) 自我期許

口述歷史和編職官表都是史料蒐集的工作，國民政府職官年表還有三冊沒做完，我必須看資料把它完成。但閱讀資料的過程卻吃盡苦頭，我必須到處奔波看檔案、資料，我也希望能從訪問紀錄中查到資料，但有時難免失望。舉例來說，我希望從近史所早期訪問的口述歷史中尋找正確資料，以便改正職官表的錯誤，但以《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為例，他是如此重要的人物，曾任教育部長，可是這本訪問紀錄卻稍嫌簡略，不夠深入，實在可惜。

我認為口述歷史工作者有責任提供「正確」且「多元」的訪談內容。在「正確」方面，有些受訪者事先未做準備，或記憶有誤，接受訪談時所講的內容可能是錯的，乃至於天花亂墜胡扯一通，或是自我誇大，甚至同樣的受訪者，可能接受不同人的訪問，同樣的一件事，卻有不同的說法。這樣的受訪者，我也碰過。其實，正確的事實只有一個。如果這種內容的訪問紀錄不斷的出版，就是廢紙一堆。口述歷史工作者應該對受訪者有問題的內容進行查證，再透過對話更正，呈現正確的內容給讀者，不要讓引用者花許多時間重新去考證。不過如何判斷內容有誤或誇

大，有賴經驗累積與功力，每位口述歷史工作者都應該把這個基本要求做好。

在「多元」方面，口述歷史的特色是，受訪者是當下活生生的人物，不是千古歷史人物，在漫長的時空背景裡，許多人事物都會被提到，受訪者批評、影射第三者的情況是免不了的，主訪者應把握與活人對話的機會，找到周邊人物接受訪問，彼此辯證對話、讓被提到的人有表達的機會，讓每一本出版品都能呈現出史料的價值與深度，讓引用口述素材的人自行判斷和取捨，不必害怕意見衝突，導致什麼都不敢問。同時，不管是重要人物、各行各業、庶民、邊緣人物，都有留下口述記錄的必要，從這些史料，呈現社會的多樣貌。這也是史料多元的意義。

我對自己的期許是，我所做的口述歷史成果，即使不是自己要用的，也要方便他人使用。舉例來說，就算從事專題式的口述訪問計畫，在面對每一位單獨的受訪者時，也要請對方從個人生平事蹟談起，不是從他（她）從事某個領域的工作談起，如此一來，便能呈現多元內容的口述歷史作品，受訪者一旦過世，最原始的東西就消失了。因此，口述歷史工作者應該要求自己，盡量多做一點、多問一點，從活人口中問出大量信息，提供使用者的便利性。

沈懷玉歷年訪問成果

一、專書

1. 沈懷玉與許雪姬合訪，《陳湄泉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
2. 沈懷玉等訪問，《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一、二、三輯（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9年）。
3. 沈懷玉等訪問，《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0年）。
4. 沈懷玉等訪問，《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紀錄》，上、下篇（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
5. 沈懷玉等訪問，《郭廷以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年）。
6. 沈懷玉與陳永發、潘光哲合訪，《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0年）。
7. 沈懷玉等訪問，《臺北榮民總醫院半世紀一口述歷史回顧》，上、下篇（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1年）。
8. 沈懷玉等訪問，《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下篇（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
9. 沈懷玉等訪問，《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一口述歷史回顧》，上、中、下篇（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2、2014年）。
10. 沈懷玉等訪問，《近史所一甲子》上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

2015年）。

11. 沈懷玉等訪問，《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上、下篇（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6年）。
12. 沈懷玉與陳永發、胡國台、孫慧敏合訪，《臺灣蛋白質化學研究的先行者—羅銅壁院士一生回顧》（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6年）。
13. 沈懷玉與許文堂合訪，《外交生涯一甲子—陳雄飛先生訪問紀錄》上、下篇（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6年出版中）。

二、期刊

1. 沈懷玉與許文堂合訪，〈王家儉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9期（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9年）。
2. 沈懷玉與羅久蓉合訪，〈吳維健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13期（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3年）。
3. 沈懷玉訪問，《楊厚明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2015年）。

三、口述史論文

1. 沈懷玉，〈談口述歷史〉，《臺北中山扶輪社刊》，第8卷第40、42、43期（臺北：中山扶輪社，1996年）。
2. 沈懷玉，〈口述訪問稿與資料的整理〉，《近代中國》，第149期（臺北：近代中國雜誌社，2002年）。
3. 沈懷玉，〈口述史料的價值與應用〉，《民國研究》，總第8輯

(南京：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2005年)。

4. 沈懷玉，〈口述歷史在臺灣的發展〉，當代上海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5. 沈懷玉，〈口述歷史實務談〉，當代上海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 沈懷玉，〈口述歷史的徵集、應用與困擾〉，宋秉仁主編，《史學與史識—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論文集》(臺北：廣文出版社，2009年)。
7. 沈懷玉，〈口述歷史延續性問題處理藝術〉，李向玉主編，《眾聲平等：華人社會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澳門：澳門理工學院出版，2013年)、許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
8. 沈懷玉，〈口述歷史的倫理問題〉，許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
9. 沈懷玉，〈訪問技巧、語言、情緒與敏感問題的處理〉，許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
10. 沈懷玉，〈口述訪談後的整稿問題〉，許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

四、其他

1. 沈懷玉，〈口述歷史的開拓者與民國軍事史、山西區域史研究

的尖兵—陳存恭先生的研究志業〉，《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1期(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

2. 沈懷玉，〈世界各國口述歷史相關資訊〉，許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
3. 沈懷玉，〈臺灣口述歷史機構相關資訊〉，許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

